

读史札记

墨海书馆迁址与停业时间考

王立群

作为近代上海开埠后西学东渐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墨海书馆同时是中国具有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知识分子的摇篮及上海地区的文化中心，在中国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墨海书馆迁址与停业时间是学术界关注已久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曾撰文对此进行过探讨。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墨海书馆何时搬迁、何时彻底停业等问题，学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本文从现存的史料入手，对相关问题进行具体探讨，以期还原历史真相，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墨海书馆迁址时间考

1843年12月，英国伦敦会^①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 1796—1857）在伦敦会传教医师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的协助下在上海创立了墨海书馆。“墨海”是砚台的别称，同时又非常接近麦都思英文名字的音译，将印刷所定名墨海书馆充分说明麦都思对在上海设立印刷所经过很长时间的筹划。从1835年麦都思到中国东南沿海考察撰写出版英文著作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中国：现状与前景》）就对上海的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并对上海地位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到1843年6月下旬，其直接携带印刷设备及所用铅字从巴达维亚启程途径香港前往上海。墨海书馆的成立其实经历一个比较长的筹备阶段，前期准备工作相当充分。在当时外国人在华不能自主建造房屋，只能在划定的区域租赁房子的条件下^②，麦都思最初在上海租赁的房子完全满足了其居住和开设印刷所的需求，上层住人，下层安装印刷设备设立印书馆。正因为麦都思前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印书馆很快便投入了运作，按照他给伦敦会总会外事秘书 Arther Tidman 书信中所说^③，墨海书馆1844年4月已经开始印刷书籍。

关于墨海书馆最初的地理位置，也有一定的争议，一说在上海县城东门外，一说在北门外，

[收稿日期] 2018-02-05

[作者简介] 王立群（1971—），女，北京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北京 100083；liqunwang@vip.sina.com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墨海书馆西学书籍的翻译、传播与中日社会近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1BWW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 ① 伦敦布道会，简称伦敦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传教组织，由英国国教会、长老会和公理会于1795年合并而成。后来，它成为英国教会在中国活动的最重要的传教组织。
- ② 1843年10月8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公使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的《虎门条约》中对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等事宜，作出如下规定：“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5页。
- ③ Medhurst: *Letter of Medhurst to LMS, from Shanghai*,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 manuscripts, SOAS Library,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CWM/LMS/17/02/002.

甚至在有些论著中,前面提出墨海书馆设在东门外,后面又提出设在北门外^①。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麦都思最初是在旧上海县城大境路租赁民舍设立墨海书馆。《(同治)上海县志》卷首的《上海县城图》明确标出了大境的地理位置在旧上海县城小北门(晏海门)一带,在西门(仪凤门)北面。今大境路尚存,为旧县城内面对原小北门的一条东西向街道,位于上海前南市区(今黄浦区)^②小北门一带。如今在小北门大境路一带,依然可看到一座残庙遗址和城墙颓垣遗迹,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段上海古城墙。在旧县城城墙外即现在人民路的西侧有一所中学名为“大境中学”,这都表明旧时大境的位置所在。由此可见,墨海书馆的原址应该是设立在上海老县城北门外的。

墨海书馆后来迁移到麦家圈,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但是对于何时迁址的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1845年,麦都思代表英国伦敦会出面租赁了今山东东路一带的大片土地来建筑墨海书馆以及其他的教会用房,因此这一地方在当时被称为“麦家圈”。问题的焦点在于墨海书馆是何时迁移到麦家圈的,王韬1849年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时是否已经迁址。两部《王韬评传》以及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对此都没有涉及,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虽然对墨海书馆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但是对此也语焉不详。

关于墨海书馆的迁址时间,主要有1845年说和1861年说。叶斌在《上海墨海书馆的运作及其衰落》中指出:“1845年底,麦都思代表伦敦会租下了英租界第61分地,面积为13.31亩,离县城北门和外滩各有半英里左右。它坐落于麦都思住宅的后面,也就是北面,长63英尺(19.2米),宽22英尺(6.7米),两层楼,有不少玻璃窗,便于排字时候的采光。房子四周围有篱笆。这便是墨海书馆的新址。”^③刘立壹在《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中也指出:“麦都思于1845年在上海县城北门外英租界购得一块土地,面积约2.5英亩(15.1757亩),价格600元。”^④麦都思后来在这个新址上建造了天安堂、住宅、墨海书馆以及华人雇工宿舍。传教士住宅为双层建筑,长80英尺、宽40英尺,建筑与设备费用支出共计近3500元,均由伦敦会支付。墨海书馆位于住宅后面,长63英尺,宽22英尺,建筑与设备费约1000元,由墨海书馆替外国商人印刷所获利润支付。”^⑤这段描述有一定的问题。麦都思1845年只是建造了墨海书馆的印刷厂房和传教士住宅,华人雇工宿舍是其后才建造的,作者将这些建筑放在一起进行描述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些建筑都是在1845年同时建造起来的,其实当时所谓的华人雇工宿舍并未动工。

王韬进入墨海书馆后先是在城北租房居住,后来搬到墨海宿舍修建的华人雇工宿舍居住。他在《瀛壖杂志》中写道:“余僦屋上海北关外,庭中颇有隙地,因种梧桐数本,鸭脚桃十余株,西风一起,颇有萧瑟意。”^⑥这说明王韬刚刚进墨海书馆工作时,并不居住在墨海书馆宿舍内,

① 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在182—183页谈到墨海书馆的创立时说:“12月23日,他们在上海县城东门外,租赁民房,居住下来,并将巴达维亚印刷所迁到上海,定名为墨海书馆。”但是,在后面的184页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墨海书馆初设上海县城北门外,后迁山东路”。不知这一错误是作者的疏忽还是排版错误。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上海人传统上将上海英租界称北市(今黄浦区以及静安区),而老城华界称为南市。南市区曾经是上海市的一个辖区,范围包括上海老城区的全部以及现在陆家浜地区、浦东上南地区。1993年1月浦东新区成立。同年3月,南市区浦东地区的周家渡、塘桥、南码头、上钢新村4个街道及杨思镇正式划归浦东新区。2000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南市区,将南市区黄浦江西岸地区并入黄浦区。

③ 叶斌:《上海墨海书馆的运作及其衰落》,《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

④ 据熊月之所言,麦都思于1846年1月,在英租界山东路租到一块业户徐彩章等的地基,面积13.31亩,年租金每亩1500文,共19546文,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45页。

⑤ 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与宣教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90页。

⑥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而是在上海北门外自行租房居住，当时墨海书馆的华人雇工宿舍尚未建造完毕。目前尚存的王韬日记中记录了他居所前后的变更情况，可以从侧面说明墨海书馆雇工宿舍于何时完工启用。咸丰二年（1862）八月十七日王韬因为合租者要迁居香港被迫另寻他处居住，倍感凄凉：“余于城北僦屋数椽，与澹人偕居。近日澹人将至香港，下逐客之令，不免谋容邾之所，以免露处。困厄之中，何所不有，思之凄绝。”^①九月初二日，王韬终于喜迁新居：“是日余迁居北城外，小楼数楹，颇绕幽致。其地僻静，人迹罕至，尽堪读书。”^②而这个房子就是墨海书馆提供给他居住的宿舍。其后他在日记中频繁提到晚上与朋友饮酒喝茶消遣之后朋友送他回墨海书馆宿舍之事。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日壬叔特市羊羔蔬簋，留余饭焉，归已更余。萃庭因携灯相送，至墨海始别去，甚可感也。”^③同年十二月初一日，“饭后往正斋寓室，因至探香楼啜茗，途遇萃庭，亦来合并。……归已二更。萃庭送至墨海始别。”^④咸丰六年二月初九日，郭嵩焘访问墨海书馆时，曾专门到王韬的寓所造访，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如下的记载：

次至墨海书馆。有麦都事者，西洋传教人也，自号墨海老人。所居前为礼拜祠，后厅置书甚多。东西窗下各设一球，右为天球，左为地球。麦君著书甚勤。其间相与校订者，一为海盐李壬叔，一为苏州王兰卿。李君淹博，习勾股之学。王君语言豪迈，亦方雅士也。为觅《数学启蒙》一书，为伟烈亚力所撰。伟君状貌无他奇，而专工数学。又有艾君，学问又粹然，麦都事所请管理书籍者也。外赠《遐迩贯珍》数部，前格物理一二事，而后录中外各处抄报，即所谓新闻报也。……王君挈眷寓此，所居室云：“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帘对孟光”。亦有意致。询其所事，则每日出坐书厅一二时，彼所著书，不甚谙习文理，为之疏通句法而已。其耶苏教或问，乃多取儒家之义相比驳，而袭引佛氏地狱之说，诋毁诬罔，以推重其术，则此数君者附会援引之勤，恐不得为无过也。夷人所住，靡不精洁。^⑤

这说明直到1856年王韬还一直在墨海书馆的宿舍中居住。在这一时期他的日记中频繁出现“出北门而归”“入城”“出城”等字眼。比如，咸丰八年正月五日，王韬写道，自己“饭罢入城”^⑥。同年八月十三日写道：“为西人安息日。晨起无事，翻读《归田诗话》一卷。邓子明来，欲同入城闲步。”^⑦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晨，与壬闾斋至城。”^⑧上述资料充分表明，从1852年9月到1858年王韬一直居住在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墨海书馆华人雇工宿舍。同时，这些材料也充分表明当时的墨海书馆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北关。

叶斌在《上海墨海书馆的运作及其衰落》一文中又指出：“1854年春天，麦都思等又在这幢房子的旁边造了另外一幢同样大小的。这样墨海书馆就有了两幢房子，一幢用于印刷，一幢用于装订。由于有了一幢新房，可以腾出地方供居住，王韬一家就免费住在这里。因此墨海书馆也就是王韬的衡华馆了。”^⑨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王韬在1852年就已经搬到墨海书馆宿舍中居住了，墨海书馆华人雇工宿舍的完工应该在1852年之前。

此外，李善兰的居住情况亦可以作为墨海书馆地理位置的一个旁证。李善兰1852年进入墨海书馆工作，居住在城北大境的关帝庙中，王韬将其住处称为“大境杰阁”。“大境在城西北隅。

① 王韬：《王韬日记（增订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页。

② 王韬：《王韬日记（增订本）》，第43页。

③ 王韬：《王韬日记（增订本）》，第56页。

④ 王韬：《王韬日记（增订本）》，第56—57页。

⑤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⑥ 王韬：《王韬日记（增订本）》，第172页。

⑦ 王韬：《王韬日记（增订本）》，第175页。

⑧ 王韬：《王韬日记（增订本）》，第179页。

⑨ 叶斌：《上海墨海书馆的运作及其衰落》，《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

杰阁三层，中供关帝像，其下槿篱茅屋，古树丛篁。……李善兰壬叔从西泠来，下榻于此。”^①咸丰二年六月四日王韬的日记中首次出现对李善兰的介绍：“晨李壬叔来舍。壬叔，名善兰，海昌诸生，精天文，善算学，能诗。”^②其后王韬日记中频繁出现二人相互往来的记载。从今淮海东路人民路口沿着人民路向西南走不多远，在上海原南市区小北门大境路一带依然能看到一段上海古城墙和一座残庙遗址，即上文提到的上海唯一现存的古城墙。这段城墙大约长 50 米，高 8、9 米，残庙即建筑于其上的大境阁。大境阁是一座抱厦式楼阁，结构精巧，造型别致，建造在大境箭台上。大境阁始建于明万历年间，里面供奉着关帝像，原称关帝殿，又称关帝庙。嘉庆二十年（1815），大境阁被改建成三层高阁，这就是目前所看到的大境阁。其后又在上面积筑了熙春台，成为民众的游览观光场所。道光元年（1821），两江总督陶澍登阁观光，亲自题“旷观”匾额悬挂在“熙春台”上。道光十六年，两江总督陈銓到此游览，亲自题“大千胜境”刻在石坊上，因此关帝庙又称为“大境阁”。从此大境阁名声大振，“江皋霁雪”被列为沪城八景之一。1912 年，在上海古城墙被拆除的过程中，由于城壕路工事务所即当时的拆城指挥部就设在大境阁内，再加上不少人强烈请求保留大境阁，这段城墙和大境阁才幸运地被保留下来。李善兰一到上海就进入墨海书馆工作，租住房屋当然要尽量靠近工作地点，而不会舍近求远，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当时的墨海书馆设立在县城北门附近，这亦可以作为墨海书馆设立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外的一个旁证。

关于墨海书馆的迁址时间，也可以根据仁济医院的迁址时间进行推断。墨海书馆和仁济医馆（Chinese Hospital）一同兴建，后来二者都迁移到了麦家圈，二者比邻而居，伦敦会传教士也经常到仁济医馆传教、说法，因此，考察仁济医院的建造和迁移时间对于我们搞清墨海书馆的迁址应当有所裨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原名施医院，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雒魏林最早在上海设立的教会医院，1846 年迁址麦家圈后改名仁济医馆，“施医院，即今之仁济医馆也，与墨海毗连，专治华人疾病。”^③最初医院设在县城大东门附近，后来迁移到小南门外。医院所租借的这两个地方都是传统的中式住宅，中间有天井。每当夏天，医院就在天井里搭起凉棚，作为候诊的场所。仁济医院现存的院史资料表明，1846 年 9 月医院迁入当时公共租界近山东路的麦家圈新址，即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部的院址，并改名为山东路医院，又称仁济医馆。迁址后的仁济医馆为一座三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并有天桥连接廊，里面设有门诊部和 60 个床位的病房。仁济医馆和墨海书馆同属于伦敦会的教会机构，一同兴建，一同搬迁，墨海书馆应该也是在 1846 年 9 月前后迁入麦家圈的山东路新馆。这也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王韬进入墨海书馆后在日记中记载了每日的工作及交游情况却从未提及墨海书馆搬迁这一历史事件。如果 1849 年之后墨海书馆才搬迁到麦家圈，王韬每天的迎来送往在日记中都记载得如此详尽却从未提及墨海书馆搬迁这一如此重大的事件，无论如何是无法解释的。这充分表明在王韬进入墨海书馆之前书馆已经搬到了麦家圈。

但吉少甫认为 1861 年墨海书馆迁入麦家圈：“1845 年英租界开辟以后，伦敦教会购进山东路一段为基地，墨海书馆于 1861 年从大境地区迁至山东路麦家圈（福州路以南的山东路一段）。”^④他的基本论据是 1845 年前后山东路还颇为偏僻，墨海书馆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迁址；60 年代以后山东路才逐渐热闹繁华起来，因此宜采用 1861 年迁址说。事实上 1861 年的墨海书馆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印刷量大减，行将倒闭，书馆此时才修建新馆迁入新址无疑是无法成立的。

① 王韬：《瀛壖杂志》，第 41 页。

② 王韬：《王韬日记（增订本）》，第 21 页。

③ 王韬：《瀛壖杂志》，第 119 页。

④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 年，第 265 页。

二、墨海书馆停业时间考

关于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一向众说纷纭。叶再生认为墨海书馆 1860 年停业，理由是此时美华书馆已经搬至上海开展业务，替代了墨海书馆，直接导致伦敦会决定关闭墨海书馆：“1860 年，美华书馆搬至上海开始出版业务后，伦敦教会就决定停止墨海书馆的业务。”^①《上海出版志》一书也明确指出：“1860 年以后，美华书馆迁来上海后该馆停业。”^②这一说法与叶再生的结论完全一致。但是该书在《1843——1949 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③中又将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界定为 1863 年，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说明该书编者对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存有疑问，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熊月之一方面指出了墨海书馆停业时间的不确定性，“墨海书馆何时停办，时间不详”^④；另一方面他推断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当在 1870 年之后，因为 19 世纪 70 年代的墨海书馆依然在活动：“光绪初年的《申报》和《万国公报》上，还有它的广告，可见到 19 世纪 70 年代还在活动。”^⑤总之，关于墨海书馆何时停止营业，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针对这几种不同的说法，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伟烈亚力来华后墨海书馆的印刷工作一直由他全面负责，直至他 1860 年 10 月因身体不适离开上海回英国进行治疗。此后原来由英国引进的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就停止了运转，因为伦敦会此后并没有再派专人来负责管理墨海书馆的出版工作，虽然伟烈亚力回国前曾就这一问题向伦敦会总部提出过正式的请求。1861 年 11 月，英商康普东（Charles Spencer Compton）接手墨海书馆的中文铅活字创办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当伟烈亚力 1862 年再次来中国时，已与英国伦敦会彻底脱离关系，转而加入了大英圣书公会，负责该会在中国分发圣经的工作。而在麦都思离世后接替他主持墨海书馆的慕维廉无疑热衷于基督教义传播而不是西学的翻译出版。他在传教实践中发现，翻译出版西学书籍对传播福音并无多大帮助，很多中国人即使积极学习西学知识购买大量西学书籍也不会因此而相信上帝，因此他无意继续发展印刷业务。滚筒印刷机就此被束之高阁，只有印刷量比较小的手摇印刷机还在使用。墨海书馆不仅错失天时，而且失去人和，从此一蹶不振，走向没落。

考察墨海书馆 1860 年停业说的来源，应该主要源自王韬《瀛壖杂记》所提出的一个非常含混的说法：“墨海后废，而美士江君，别设美华书馆于南门外，造字制板，悉以化学，实为近今之新法。”^⑥一些研究者从王韬的这一表述中推断出 1860 年美华书馆建立和墨海书馆倒闭是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成立。虽然美华书馆迁到上海后确实逐步取代了墨海书馆在上海印刷行业的重要地位，但是美华书馆建立后墨海书馆并没有马上关闭。王韬的《瀛壖杂记》于 1853 年写成 2 卷，1871 年又增撰 6 卷，上面的引文显然是王韬 1871 年时补记的，而当时王韬已经流亡香港近十年，其间并没有回过上海，对墨海书馆的情况谈不上了解，这一信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揣测和推断。王韬在 1862 年 10 月 5 日因上书太平天国事件在老雇主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的帮助下离开上海避难香港，之前他一直“佣书墨海”，以中文编辑的身份协助传教士翻译西学书籍，这从另一个方面充分证明直到 1862 年墨海书馆依然存在。因此，1860 年墨海书馆停业之说就不攻自破了。

① 叶再生：《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出版史料》1990 年第 1 期。

② 上海出版社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年，第 223 页。

③ 上海出版社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出版志》，第 249 页。

④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87 页。

⑤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88 页。

⑥ 王韬：《瀛壖杂志》，第 119 页。

墨海书馆 1863 年停业说产生的缘起可能是胡道静在《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一文中对墨海书馆停业原因的分析：“对墨海书馆来说，人也跑了（按：“人”指王韬），要干的事也有很多的其他有力机构去承担了，该退位了。这大概是墨海终止译印西方科技书籍的根本原因。”^①王韬是最早进入墨海书馆工作的中国口岸知识分子，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和他一同参与西书翻译工作的中国士子都在他之前先后离开墨海书馆另谋高就。周双庚、陈萃亭在墨海书馆工作的时间比较短，因为对与西方人合作持强烈排斥态度，他们早在咸丰二年（1852）就离开了墨海书馆。咸丰九年，张福禧应时任江苏巡抚的著名数学家徐有壬的邀请进入其幕府工作，与他一起校对《项学正象数原始》。其后不久，李善兰也应邀进入徐府担任幕僚。咸丰十年春，管嗣复进入绍兴怀午桥太守幕府任幕僚。同年九月，蒋敦复应上海县令刘郇膏之邀离开已任职七年的墨海书馆，着手编纂《上海县志》。正如上文所述，王韬于 1862 年 10 月流亡香港，墨海书馆翻译西学著作的中方翻译人员至此可以说各奔西东。加之美华书馆等印刷机构的兴起，直接导致墨海书馆失去原来的生存空间，因此，有研究者据此推断墨海书馆 1863 年停业。但是，这一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资料支撑。胡道静的说法其实基本站得住脚：第一，他分析的结论主要落在翻译人员各奔东西之后“墨海终止译印西方科技书籍”；第二，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墨海书馆何时停业，其实是一种取巧的说法。

那么，墨海书馆到底何时完全停业？“1873—1876 年间，墨海书馆曾多次在《申报》上刊登出售新书的广告。出售的书籍主要有《中西闻见录》《普法战纪》《覲见图》《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益智新录》《格物探源》等。”^②目前所能看到的 1877 年 4 月版的《格致汇编》上还印有“寄售处墨海书馆”字样，这无疑是当时的墨海书馆依然在正常运转的一个有力证据。从《申报》上所刊登的墨海书馆图书销售广告和其他书店出版的图书上所印有的“寄售处墨海书馆”字样看来，墨海书馆后期已经不再开展印刷业务，而主要是作为一个图书发行机构存在。麦金托什指出，就在“伟烈亚力先生离开的同时，伦敦教会书馆关闭”^③。1877 年 7 月 8 日，伟烈亚力因双目失明离开中国返回英国，而他离开的时间也正是墨海书馆停止营业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断，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应该是 1877 年 7 月。熊月之关于墨海书馆 1870 年以后停止营业的说法比较宽泛，不能说是错误，但显然不够确切。

综上所述，自 1860 年美华书馆从宁波迁址上海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迅速拓展印刷业务，成为当地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终结了墨海书馆原来在上海一枝独秀、独霸一方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墨海书馆的发展，挤压了墨海书馆的生存空间。1861 年秋，墨海书馆把印刷设备盘给了《上海新报》，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却丧失了基本的印刷出版功用，这成为墨海书馆走向没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伦敦会总部也产生了关闭墨海书馆的意向。卖掉印刷设备后，墨海书馆基本上沦落为一个图书的销售发行机构，又在上海存在了 16 年，1877 年 7 月停业，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① 胡道静：《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史料》1988 年第 1 期。

② 陈昌文：《墨海书馆起讫时间考》，《史学月刊》2002 年第 5 期。

③ Gilbert McIntosh,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p. 34.